

中國當代文學史

姚雪垠題簽



陈其光 主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史

主 编

陈其光

920747

编 著

陈其光 赵士聪 邝邦洪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粤新登字09号

中国当代文学史

陈其光 主编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乳源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75印张 460千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500册

ISBN7—5361—0809—5/I·60

定价：平装本9.80元 精装本14.50元

前 言

编写一本适应高等院校本科和大专班教学实际需求的中国当代文学教材，是我多年的夙愿。80年代初，在丁玲同志家中谈起此事，她非常支持并鼓励我们要有勇气、秉公执言，要求实、不察颜观色。她希望有更多的个人来做这项“难度很大”又“带有风险”的编写工作。10年过去了，许多同行专家学者先后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鉴于本地区高等院校本科、专科广大师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需要，我们结合多年来教学与科研实践的心得体会，并学习同行专家学者们近几年出版的文学史专著和研究资料，本着力求博采众长的主旨，试着熔史论为一炉的作法，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历史的、美学的观点，来阐述新中国成立后40年来文艺运动的发展、衍变的规律，分析当代文学创作的成败得失，并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和探讨其历史经验教训，为高等院校文科广大师生编著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并编选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两部配套教材。

历来写史多就远避近。正如康濯同志为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主持编写的中国当代分类文学史丛书小说史作的“序”中所说：“这是由于远者经过时代沧桑变异与年光磨洗筛淘，不论在宏观构架或微观梁椽乃至在各个实践层面与个别学术门类上，又不论是时代功过、人事是非或建树高下、新陈扬弃，都无不将去粗而存精、去杂而珍在、去尘而本现、去伪而真显。因而著述远史尽管随作者不同也仍将选取有异、观点相别、分歧难免，甚或选材虽同而落

点仍难一致，但在大的背景与宏观功过、是非上总将是风险较小而保险系数较大的。若近世史特别当代史则不然，首先仅仅资料就将广而难全，杂而难选，新而难弃，特别是过分逼近而难认；其次更主要者乃在是非、功过、分歧和议论难辨，往往偏于任何一面都将引来指斥，即使百家并述也总难免于倚重而遭非。特别是或有若干重要史实由于过分靠近和涉及敏感的神经，写则必冒大风险，不写又将导致大责备，这就使得历来治史之就远避近成为非此不可或情有可原。”鉴于此，尤其受政治干涉较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方面由于是“近距离”的观察和思考，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当代人评当代事”的局限。而这种局限又是多方面的，诸如政治的、理论的、急功近利的、历史因袭的以及其他非文学的视野与认识因素等所造成的失误和偏颇。另一方面由于在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泛滥的时间很长、影响很深，文艺领域中许多理论与创作问题被搞乱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殊规律和发展轨迹被倒错、抹杀了，造成了文坛上许多评估的错位和判断的失误。这就给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与阐释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和更大的阻力。的确，编写当代的文学史，丁玲曾说过：“要涉及到许许多多健在的、有权势的、有种种复杂社会关系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还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要较为准确地认识和评估这些纷繁复杂的人和事，是需要有个发展演变过程的。特别是对一些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更需要经过反复的认识、研讨和实践。也许，历史沉淀的时间愈久，经过读者和研究者审度的时间愈长，就愈能看清问题的真相，评价就愈趋于准确和科学。因为当时评论者那种即事感受、审美冲动以及妨碍科学思考与辩证分析的种种因素，已时过境迁，日渐消失了。但是，为了适应当前教学和社会读者自学之急需，也只好匆促上马，斗胆编写了这套教材。

该配套教材分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册，是参照教育部委托华南

师范大学中文系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大纲》中的“社会主义时期文学”部分进行编写的。基于当代文学的延伸、发展以及本课程的的教学实际需求，特作以下三点说明。一是本书编写的上限时间是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下限时间为1988年11月召开的全国第五次文代会。4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走了一条大幅度曲折的“之”字路。它的发展三起两落，形成了两个马鞍型。以“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为界，划分为前17年和后13年。其中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集团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三年时间，属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阶段。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建国17年后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发展和遭受挫折的倾斜期；中间10年，被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所席卷，整个神州大地，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动乱之中，文学艺术战线万马齐喑，文坛百花诸卉在“黑线专政论”的淫威下，皆“零落成泥碾作尘”；后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为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而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成为当代文学史上转折的里程碑。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虽然“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是，此后的两三年，党的指导思想还处在“两个凡是”的束缚下，连“文化大革命”这样给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的错误政治运动还仍然被看成不可触犯禁区。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和现象就更为纷繁万状了。为此，只有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联系当时国内外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艺思潮，并对纵与横两个方面的关系及其来龙去脉，作深入的考察和具体的阐释，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美学的、历史的判断。二是根据建国以来我国文艺运动多是从属于政治运动，文艺思想与理论观点又都紧密配合政治方针与政策这一特征，我们在对建国后文艺上重

大的思想与理论的论争和作家作品的重评时，既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识，尽可能从众多的资料对比中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又依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对作为历史的种种文学现象，对作为“生活的镜子”、“历史的脚印”的文学作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美学观进行再认识、再评价。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节南巡视察时曾说过：“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

‘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段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谈话，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他从90年代以来前苏联、东欧局势的遽变以及当今中国社会的现状，清醒地悟出“左”的危害性和防“左”、反“左”的必要性，对我们回顾与反思建国以来文艺战线上两种倾向斗争的历史，将给予深刻的启迪和定向的指引。随着实践检验真理的深化过程，我们立足于今天的认识高度反思过去、直观现实，就会从再认识中更深切地体会到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尖锐的针对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要重新对各种文艺思潮进行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评析，既要警惕向右逆转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但是，当前更重要的，是要摆脱僵化的庸俗社会学观点，防止那些打上革命旗号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极左文艺思潮的干扰与破坏。三是本书乃集体编写的产物。从体例到章节的设置，基本上是结合高等师范院校本科课程教学实际需要而安排的，包括文艺运动、文艺思想论争、各类文体创作概述以及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专节分析等四大部分。全书编写的提纲由主编拟出，经同赵士聪、邝邦洪同志

切磋琢磨后分工编写。其中各类文体创作概述部分，由陈其光同志指导的三位中国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邵一飞、伍尚红和许华执笔，最后全书交由陈其光同志负责统稿和定稿。原计划把作为本专业课教学内容的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台港文学概观”收入本书，但由于篇幅所限，而且近几年有些学校把它作为本科一门选修课单独开设，另有教材，故本书不再收入。限于时间，对浩如烟海的史料的筛选，难免有遗珠之憾；限于篇幅，对许多著名的作家及其作品只能在概述部分略微提及；限于水平，书中疏漏和偏颇之处，在所难免。祈望听到专家和读者的意见后，将来有机会再予修订。

本书的编写，曾参阅和吸收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本书的付梓，多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熊福林同志、副编审杨明新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于此一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陈其光

1992年7月于华南师范大学

绪 论

1949年10月1日，在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大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地成立了。自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阶段。作为描写生活、反映生活并推动生活前进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同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发端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新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打从新中国诞生时，准确点说是从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时开始，便进入了新的阶段，即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阶段。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至今，仅40多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特别是在我们这一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里，显得很短暂、很年轻。唯其年轻，因而具有以前的文学（包括现代文学）所没有的特质。它是生气勃勃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所在。几乎谁都不能否认，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新水平，总是由它的当代文学来体现的。已有的水平只能说明过去，希望永远在未来的一面。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虽然是曲折的，但它是前进的。它虽然很年轻，很不成熟，但充满生机，充满希望，它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程，将越来越引起国内外人们的注目、关心和重视。

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

众所周知，文学艺术是一定的社会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它既反映了客观的社会生活，又渗入作家主观的思想情感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认识和评价。因此，它不但形象地

反映出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面貌和时代风貌，也体现出特定时代的政治、哲学、法律、道德、伦理以至宗教的观点。据此，我们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性质的区别，主要应从它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和它所引起的社会历史作用来考察。

在我国，以“五四”运动为起点，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这两个阶段，革命总的指导思想相同，因而有其不可分割性。但是，由于不同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不同，性质不同，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的文学的性质当然也就有所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那时的文学所反映的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生活和斗争，它所起的社会历史作用也是反帝反封建。因此，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其性质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指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学。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革命的目的在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通过四个现代化的途径，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反映并促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发展和不断完善、巩固，反映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斗争生活，陶冶人民的思想情操，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帮助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当代文学的光荣使命。这一时期的文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时代广大人民（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尽管它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若干的曲折，而且今后也仍将经历一条艰难甚至曲折的道路，但从总体来看，它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

二、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它是从中国古代文学特

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而来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新民主主义论》）的确，只有如此，才能弄清当代文学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以正确认识它，并推动它的发展。

首先必须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为当代文学的产生提供了革命的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准备了基本的队伍。“五四”新文学，自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和中国革命以及领导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孕育和影响，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深受社会发展的先进思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影响和指导，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提高为革命事业服务的自觉性。这正是现代文学的实践经验，也是现代文学提供给当代文学的革命传统。它是保证当代文学把准方向，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重要传统。作为革命文学，当然要接受革命政党的领导，不能因为领导的方式、方法曾出现一些偏差而否定或摆脱党的领导；也不能因为批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和现象，而否认文学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必须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国现代文学在其30年的发展过程中确实积累了很多经验，诸如政治方面的领导经验、对错误的文艺思潮的斗争经验以及文艺队伍建设的经验。还有艺术方面的：深入人民的生活，反映时代跳动的脉搏，表达人民的心声；在批判地继承和借鉴中外文学遗产的基础上促进文学的民族化和现代化；坚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发展多样的文学形式、文学风格和文学流派等等的经验。现代文学还为当代文学准备了两支骨干队伍：城市知识分子作家即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和革命根据地（即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这两支队伍各有所长，他们汇合在一起，成为解放后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中坚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文学事业的面貌。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继续和发展。它在现代文学的

发展过程中与日渐增地孕育着，特别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的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进步文学，一起为当代文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使当代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其次是中外文学遗产滋养着并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的建立和发展。三千多年灿烂而悠久的祖国古典文学有其优秀的传统，外国文学也有值得借鉴和采用的良规。鲁迅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且介亭集·〈木刻纪程〉小序》）这一重要经验，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良好的印证，并为当代文学提供了范例。事实证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离开自己民族优良传统，不学习外国文学的长处，是不能健康地迅速地发育和生长的。什么时候重视这样的经验，什么时候文学艺术就发展，反之，就遭到挫折和损失。

“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阴谋目的，割断历史，鼓吹什么“空白论”、“从零做起”，既否定我们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又摒弃外国的进步文化，结果，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没有文艺。8亿人民仅有8个“样板戏”，连大学文科的讲坛上，也只能让鲁迅先生走在《金光大道》上学习《毛主席诗词》、欣赏“样板戏”。这不就从反面说明批判地继承和借鉴中外文学遗产的重要吗？

再次，新的人民政权的建立，开创了新的建设时期的历史；新的历史阶段人民的新生活以及艰难曲折的新的社会斗争，为新的文学——当代文学的发育和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三、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

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成就，这个问题争议颇大。有些人机械地从作品、作家队伍、尤其是老作家前后期著作的情况，将中国

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作比较，得出“当代文学成就不大”的结论；有的则片面地着眼于40多年来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受到“左”倾思潮影响的情况，而得出“当代文学成就不大”的结论；当然也有一些人笼统地说，“当代文学的成就就是比现代文学的成就大”。如此等等。

对于以上的这些说法，我们都不敢苟同。我们认为，看一个时期的文学成就，是要有所比较的（当然，要比较得全面），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就其自身的实际情况，根据其自身表现出来的特点，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分析，作出恰如其份的估价。因为，不同时期的作品，其侧重反映的生活面不同，所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因而文学地位也有异；不同的作家，由于其思想素质、生活经历、文学造诣等各不相同，写出的作品的文学地位当然也不同；就是同一作家，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或因生活阅历限制，或因爱好有所转变，或因身体条件限制，或因客观环境束缚等等，其一生过程前、中、后期作品的成熟程度也有所不同。平常有人会说，某些老作家解放后没写出什么好作品来，比不上解放前。这些人往往没具体注意到这些作家也写出了这样那样的具有新的艺术成就的新作，或有另外的艺术探讨和研究。再说，也不是所有的作家后期的作品一定比不上前期写的成就高。如姚雪垠前期写的《差半车麦秸》、《戎马恋》、《长夜》等就比不上后期写的《李自成》成就大；欧阳山前期写的《玫瑰残了》、《竹尺与铁锤》等就比不上后期写的《高乾大》和《三家巷》成就大，即便是《高乾大》，其总体艺术成就和影响也比不上《三家巷》、《苦斗》等系列长篇《一代风流》大；柳青的更是这样，《种谷记》、《铜墙铁壁》比不上《创业史》成熟；秦牧，40年代出作品，但丰收期、成熟期却在解放后，尤其是60年代初期；贺敬之同样，影响大的作品还是50年代中写的《放声歌唱》和60年代初写的《雷锋之歌》。

……正因为如此，不能仅着眼于某一作家或几个作家的创作情况，以偏概全地片面下结论。看一个时期文学的成就起码必须从其方向路线、从其创作本身、从文学理论与批评、从文学队伍等几个方面作全面的分析，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下面，我们试从这几个主要方面来看看当代文学40多年的基本情况：

1. 在文学的方向、路线方面，应该说从总体来看，当代文学是在斗争中不断贯彻执行了党的正确的文艺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尽管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左”、右思想倾向的干扰，迂回曲折，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后，“左”的思想的干扰日渐严重，甚至发展到10年浩劫期间把它推向极端。但是，各个时期，党的正确路线始终与错误倾向斗争着，更不待说“文革”前17年和“文革”后的新时期，文艺战线始终是党的正确路线占着主导的地位。即便是“文革”中极“左”的思想路线，也毫不例外地受到正直的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的抵制和抗争，正确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最终还是战胜了错误的文艺路线而使社会主义文学得以继续发展。统观40多年的情况，总的来说，文学已从个人的事业变为在全国范围内，在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并在鼓舞人民为社会主义美好未来而奋斗方面起着极为广泛的有益的作用。它是在党领导下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

2. 在文学创作方面，总的来说，不论从内容或形式方面看，都是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风貌，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所接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具体表现在：（1）在作品内容方面，题材扩大了，思想更新了，基调也改变了。当代文学不仅继续描写和讴歌革命斗争生活，还特别注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斗争生活。可以说，社会主义时代里人民的生活命运和思想情绪的变化，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都在文学中得到了编年史般的反映；各条战线的宏伟斗争和战绩，各个地区的风习人情，也都在

文学中得到生动的描画。尤其是在描写工业题材、历史题材、国际题材、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干部题材等方面，可以说填补了现代文学的空白。而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题材“禁区”被突破，文学的内容就显得更进一步的扩大和更新了。例如，在反映革命斗争生活方面，有反映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生活的金山的《红色风暴》、欧阳山的《三家巷》、艾明之的《火种》、王愿坚的《党费》等；有描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各种形式的武装斗争、城市地下斗争和农村革命运动的，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李准的《黄河东流去》等。描写工业题材的有草明的《火车头》、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艾芜的《百炼成钢》、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崔德志的《报春花》等；写历史题材的有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郭沫若的《蔡文姬》、卞元元的《林则徐》、曹禺的《胆剑篇》、姚雪垠的《李自成》、凌力的《星星草》、端木蕻良的《曹雪芹》等；写国际题材的有艾青的组诗《南美洲的旅行》、《大西洋》及杨朔、刘白羽反映亚非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散文和大量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的作品等；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有沙叶新的《陈毅市长》、程大荣等的《西安事变》、白桦的《曙光》、翟禹钟等的《彭大将军回故乡》以及集体创作的《烈士诗抄》、《天安门诗抄》等；写农村变革题材的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孙犁的《铁木前传》、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系列小说、何士光的《乡场上》等。还有反映现实生活矛盾的，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还有写知

识分子题材的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等新时期出现的一大批作品。(2)人物塑造方面,在作品中,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尤其是工农兵、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等新人形象占据了突出的位置,大量地成为作品的主人公。这说明在当代文学里,文学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成为文学的主体;也说明文学创作进一步与广大人民的斗争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在作品里,不但社会主义的英雄形象、新人形象占据突出的位置,而且这些形象也越来越丰富多彩,更显出复杂性和立体感。譬如,下面一些形象就都是极富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如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朱老忠、杨子荣、江姐、周大勇、董存瑞等;四化建设征途中的新英雄:乔光朴、郑子云、李健等;正在成长中的新英雄和新人形象:林道静、琼花、雷锋、白洁、陆文婷、梁三喜等;转变中的人物形象:梁三老汉、许茂、赵满囤、陈奂生等;老一辈革命家形象:彭德怀、周恩来、陈毅、贺龙、毛泽东等;反面人物形象:徐鹏飞、张灵甫、崇祯、陈文雄等。还有其他一些“非驴非马”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真可谓琳琅满目。(3)在形式、风格方面,当代文学的体裁、样式更加丰富,作家的艺术风格也更趋于民族化、群众化和现代化。由于时代和生活的不同要求,文学作品的体裁、样式必然更加多样,解放后除继续发展以往几种固有的体裁样式外,还增加了诸如革命回忆录、电视剧、广播剧、科学诗等等的新品种,而报告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叙事诗、儿童文学、电影文学等则比以前有更新更大的发展。在艺术风格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作家的实践的变化,许多老作家逐步克服了以前的知识分子腔、冗长的欧化语言等,使文学更趋于民族化和大众化;再加上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文学与生活、与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更使作家们的艺术风格趋于民族化和大众化。除老作家外,许多建国后新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作家,更勤于耕耘,努力创

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梁斌、杜鹏程、茹志鹃、王愿坚、郭小川、闻捷、李瑛、王蒙、刘绍棠、高晓声等。即便是“文革”后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作家，也有不少已形成自己的风格，如蒋子龙、刘心武、张洁、张抗抗、王安忆、贾平凹、舒婷等。（4）在创作方法方面，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经不是仅仅为少数作家所掌握，而是为广大作家所自觉接受和运用，并居于主要地位。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与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这种创作方法正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与此同时，革命浪漫主义及其他创作方法也广泛用于创作中。近些年来，一些作家还在积极探索如何借鉴、吸收西方文学中的其他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5）在兄弟民族文学的发展方面，建国以后，党对兄弟民族文学的繁荣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方面大力培养民族作家，另一方面组织汉族的文艺工作者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创作或与兄弟民族的文艺工作者联合搜集整理民族地区的作品。至今，蒙、藏、壮、满、维吾尔、傣、彝、白、朝鲜等族，均有自己的作家和作品，同时也整理出诸如《阿诗玛》、《召树屯》、《格萨尔王》等多部民族叙事诗及其他作品，出版了一批兄弟民族的作品。粉碎“四人帮”后，对港、澳、台文学及一切属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文学也给予充分的重视。

3. 在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也就是说，在马列主义文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和研究方面，在文艺理论的研究方面以及对文艺规律的探讨，对文艺新问题和新情况的研究，对中外文学遗产的研究，对作家、作品的评介等方面，建国以来虽然遭受“左”、右错误思想和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但总的说来，还是有成就、有进步的。几十年来，我们除发表、宣传马列文论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些关于文学的精辟论述外，许多文艺理论工作者在研究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的新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探讨的理论